

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述略

王腊宝

内容提要：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是在欧美后现代文学影响之下出现的，历经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写作”、80 年代的“新小说”和 90 年代的“后现代文学小说”等三个阶段，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一、不以“后现代”命名；二、在游戏之中表现一种“后现代崇高”；三、在世纪末的“文化战争”中受到反后现代主义的保守派的拒斥。在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过程中，澳大利亚表现出了显著的“滞后”特征，这一点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派文学在澳大利亚的命运相似，更与澳大利亚这个后殖民国家的地理、历史以及身份定位密切相关。

关键词：澳大利亚 后现代小说 新写作 新小说 后现代文学小说

中图分类号：I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1-0036-09

二战以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风靡英美，60 年代以后，后现代文学在其他英语国家也陆续出现。在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创作从 60 年代开始萌芽，在此后三十多年时间里，吸引了一批作家的参与，在历经 70 年代的“新写作”(New Writing)、80 年代的“新小说”(the New Novel)以及 90 年代的“后现代文学小说”(post-modern literary fiction)之后，形成了澳大利亚独有的后现代小说风貌，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轨迹。(Hauge: 50—51)本文立足上述三个阶段对澳大利亚的后现代小说的流变进行梳理，从中考察其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进程中的历史演变特点和艺术发展规律，最后就后现代小说与当代澳大

利亚文学的关系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

在澳大利亚小说史上，人们经常把怀特(Patrick White)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统称为澳大利亚的现代派或“怀特派”。(黄源深，1997：400—01)与英美等国相比，澳大利亚的现代派文学可谓“姗姗来迟”，(黄源深，1992：53)所以，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澳大利亚，以“怀特派”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似乎乍一出现就受到了又一种新小说风尚的冲击。70 年代初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一批倡导小说实验和创新的年轻作家整体崛起，他们创办自己的《故事小

报》(*Tabloid Story*, 1972), 以“新写作”的名义推介自己的作品。怀尔丁(Michael Wilding)在《故事小报袖珍集》(*The Tabloid Story Pocket Book*)的前言中指出,《故事小报》在出版过程中坚持的原则是:“不发表程式化的丛林故事,不就小说的开头、中段和结尾作出限制,不就小说结构完整性作出严格要求,……我们强调开放,反对限制,反对程式化的丛林故事和有板有眼的叙事,写这样故事的大有人在,我们不想再去鼓噪,我们希望为那些不为传统期刊重视的其他小说提供发表的园地。”(Wilding: 302)显然,“新写作”倡导实验性、寓言性和先锋性,希望通过非现实主义的写作,启动又一个澳大利亚小说的创新进程。

“新写作”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和怀尔丁。穆尔豪斯60年代开始短篇小说创作,整个70年代,他无疑是澳大利亚最多产的短篇小说家,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先后出版了《美国人呀,孩子:一些故事与碎片组成的间断叙事》(*The Americans, Baby: A Discontinuous Narrative of Stories and Fragments*, 1972)、《触电体验:间断叙事》(*The Electrical Experience: A Discontinuous Narrative*, 1974)、《会议城》(*Conferenceville*, 1976)和《神秘与浪漫故事》(*Tales of Mystery and Romance*, 1977)等近十部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关注社会和政治,也关注个体经验,尤其关注个体私密的经验与公共的历史经验的交叉;他的作品敢于突破禁忌,大胆表现性爱主题,坚持探讨人类性爱欲望与日常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短篇小说形式上,他坚持叙事实验,喜用一种独特的“间断叙事”(discontinuous narrative),不少作品积极探索文字排版中的颜色和字体安排对叙事的影响,有些作品大

量运用二战后报纸上大众常见的醒目标题、清单、书信、笔记、书目、图表、插图等。他的小说没有传统的线性时序,上述叙事形式上的变化给他的小说带来一种突出的“间断”感受。(Torre: 437—38)怀尔丁生于英国,曾就读牛津大学,后移居澳大利亚,并在悉尼大学任文学教授。移居澳大利亚之后,怀尔丁感觉自己一步踏入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后现代小说创作环境之中。他于70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包括《漂染过程面面观》(*Aspects of the Dying Process*, 1972)、《同住》(*Living Together*, 1974)、《中西部地下》(*The West Midland Underground*, 1975)、《短篇小说使馆》(*The Short Story Embassy*, 1975)、《景观大道》(*Scenic Drive*, 1976)、《雄性森林》(*The Phallic Forest*, 1978)等。他的短篇小说从题目到内容同样突出地表明他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文学理论的浓厚兴趣:他的作品热衷书写城市生活,关注性和毒品体验,体现了强烈的“反文化”特征;此外,他的小说喜用戏仿、反讽和寓言,许多作品具有奇幻性和元小说的特点。(Torre: 439)

1977年,著名文学批评期刊《澳大利亚文学研究》(*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以“新写作”为题邀请穆尔豪斯、怀尔丁、凯里(Peter Carey)和贝尔(Murray Bail)等作家就自己的创作发表看法。穆尔豪斯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自己的创作受到过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和B. S. 约翰逊(B. S. Johnson)等外国作家的影响。怀尔丁则说自己受到过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米勒(Henry Miller)等人的影响。凯里和贝尔则表示自己受到了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巴斯(John Barth)、贝克特(Samuel Beckett)、库弗

(Robert Coover)和契弗(John Cheever)等人的影响。(Torre: 435)由此不难看出,影响澳大利亚“新写作”最多的绝大多数都是后现代作家。^①

1977 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基尔南(Brian Kiernan)以《最美丽的谎言》(*The Most Beautiful Lies*)为题编辑出版短篇小说集,收录了怀尔丁、穆尔豪斯、贝尔、凯里以及卢里(Morris Lurie)等五位作家的十多部短篇小说作品,在该书的前言中,基尔南指出,澳大利亚“新写作”视小说为“人造艺术”(artifact)和“虚构艺术”(fabulation),(2—3)作品形式充分表现出一种游戏性、实验性和跨界的特征。(Goldsworthy: 541)基尔南小说集的题目源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②作为编者和批评家,基尔南的本意是说,该书收录的作品重虚构而不重事实,因此属于“谎言”一类,但这些作品又充满了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因此是“美丽的谎言”。基尔南没有使用“后现代”来指称这些作品,因为 70 年代中期前后的澳大利亚批评界似乎并不存在“后现代小说”这一说法,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新写作”的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以在批评界继续沿用,就连“谎言”这一说法也一直沿用到 80 年后期。(Lever: 313)

二

70 年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中的实验主义“新写作”至 80 年代在长篇小说中得以更加普遍地推广,1988 年,丹尼尔(Helen Daniel)在《谎言家:澳大利亚新小说家》(*Liars: Australian New Novelists*)一书中特别列举了 1980—1988 年间七位作家出版的二十五部长篇小说,并对其逐一进行了评论。

马雷·贝尔 (Murray Bail)	《思乡》(<i>Home ~ sickness</i> , 1980)、《霍顿的表现》(<i>Holden's Performance</i> , 1987)
尼古拉斯·哈斯勒克 (Nicholas Hasluck)	《蓝吉他》(<i>The Blue Guitar</i> , 1980)、《喂你的手》(<i>The Hand That Feeds You</i> , 1982)、《伯拉明瓶》(<i>The Bellarmine Jug</i> , 1984)、《懒散状态》(<i>Truant State</i> , 1987)
彼得·凯里 (Peter Carey)	《幸福》(<i>Bliss</i> , 1985)、《魔术师》(<i>Illywhacker</i> , 1985)、《奥斯卡和露辛达》(<i>Oscar and Lucinda</i> , 1988)
戴维·福斯特 (David Foster)	《月光族》(<i>Moonlite</i> , 1981)、《铅》(<i>Plumbum</i> , 1983)、《狗摇滚》(<i>Dog Rock</i> , 1985)、《基督教蔷薇十字架历险记》(<i>The Adventures of Christian Rosy Cross</i> , 1986)、《睾酮》(<i>Testostero</i> , 1987)
戴维·爱尔兰 (David Ireland)	《女人城》(<i>City of Women</i> , 1981)、《生身父亲》(<i>Bloodfather</i> , 1987)

① “新写作”派作家很少承认自己受到怀特的影响。有的作家甚至表示,在怀特去世之前,自己坚决不看他的作品。参见 Stephen Torre, “The Short Story Since 195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Ed. Peter Pierce. Melbourne: Cambridge UP, 2009.

② 马克·吐温的原话是:“澳大利亚的历史几乎总是美如画中的风景,它如此新奇和怪异,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它读起来不像历史,倒像是最美丽的谎言。”

杰罗德·莫内恩 (Gerald Murnane)	《平原》(<i>The Plains</i> , 1982)、《景观对景观》(<i>Landscape with Landscape</i> , 1985)、《内陆》(<i>Inland</i> , 1988)
伊利莎白·乔莉 (Elizabeth Jolley)	《斯科比的谜》(<i>Mr. Scobie's Riddle</i> , 1983)、《皮博迪小姐继承的遗产》(<i>Miss Peabody's Inheritance</i> , 1983)、《牛奶与蜂蜜》(<i>Milk and Honey</i> , 1984)、《狐媚娃娃》(<i>Foxybaby</i> , 1985)、《井》(<i>The Well</i> , 1986)、《糖妈妈》(<i>The Sugar Mother</i> , 1988)

在丹尼尔列举的上述七位作家中,凯里和贝尔成名于70年代,是早期“新小说”最得力的干将。凯里被蒙罗(Craig Munro)誉为“整个70年代崛起的最耀眼的才子”。(xii)80年代,他连续出版四部长篇小说,其中,《魔术师》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新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小说叙事人巴杰利(Herbert Badgery)开宗明义地说自己是个139岁的骗子(生于1886年),小说开篇之时应是2025年。小说随处运用元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一种散漫的风格讲述了他的婚姻、家庭和生活故事:1919年,三十三岁的赫伯特驾驶着他的飞机降落在富有的麦克格劳斯(Jack McGrath)家的农场上,此后他爱上了后者的女儿菲比(Phoebe)并与其结婚生子。麦克格劳斯自杀身亡后,菲比离开了他,赫伯特于是又与麦克格劳斯的妻子相恋,后因伤害罪入狱,出狱后不久便中风病倒。《魔术师》像很多流浪汉小说一样时空跨度大,小说通过众

多的人物故事连接较为完整地触及到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存在的真与假、现实与虚构。贝尔80年代共出版两部长篇小说,他善用神话、童话、奇想以及元小说的戏仿讽刺当代澳大利亚社会生活,对现实主义的澳大利亚文学传统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写作的目的是让读者质疑和嘲笑传统小说的现实模仿特征,在他看来,模仿的文学不是真实的文学。小说《思乡》是贝尔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叙事刻画了一群前往世界各地游览的澳大利亚观光客,作品通篇无情地鞭挞澳大利亚人的粗野笨拙、狭隘无知。《霍顿的表现》讲述了澳大利亚唯一一个本土汽车品牌的创始人沙德博尔特(Holden Shadbolt)的故事,小说语言简洁但充满游戏、双关语和反讽,小说家用主人公特有的机械意识和眼睛将一个具有史诗性的题材处理成一个装满碎片的叙事。

福斯特80年代出版的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普遍表现一种对事物本质的近乎荒诞的探寻,他精力旺盛,痴迷创新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他的小说中常常是颂扬与戏仿同在,旺盛的精力与彻底的绝望同在,极度的喜悦与深刻的厌恶同在。《月光族》是一部讽刺殖民主义的反话语作品,小说讲述了一群来自苏格兰外岛居民先后移居澳大利亚并在这块殖民地里驱逐当地土著居民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读者时刻能感觉到美国后现代作家品钦(Thomas Pynchon)和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那种夸张,更感受到后现代小说所特有的力量。哈斯勒克80年代先后出版四部长篇小说。其中,《伯拉明瓶》采用侦探小说和司法调查的某些手法讲述了上世纪40年代某大学发生的一个学生动乱故事,从中挖掘出历史上1629年该大学创始人曾经参与的一段轮船哗变历史,继而更深刻地挖掘出欧洲白人

对澳大利亚的早期殖民史。小说情节广泛涉及荷兰、伦敦和澳大利亚,涉及的历史事件包括英国在太平洋的原子弹试验、印尼的独立运动以及国际法和国际人权合约的早期确立等。哈斯勒克的小说具有英国作家福尔斯(John Fowles)和南美作家博尔赫斯的某些特征,作品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海上航行故事。但不同于同类传统海上小说的是,哈斯勒克小说的人物并不能通过这些航程获得任何发现,他们根据地图上的标记去寻找一些岛屿,但是,航行让他们知道,那些不知什么时候被标上地图的岛屿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反观那些地图所宣示的真实,他们认识到了它们虚妄的本质。在哈斯勒克看来,一切所谓的真实或许不过是一种宣示而已。

莫内恩 1988 年出版的《内陆》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元小说,小说叙述者战战兢兢,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时时担心自己讲不好故事,或者说时时担心自己的叙述会被人误会。叙述者很焦虑,因为他不知道究竟应该写什么,他不停地说话,可好像又什么也没说。莫内恩是 80 年代澳大利亚最大胆创新的后现代“谎言家”之一,在小说《内陆》中,他不断地让读者看到写作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在莫内恩看来,虚构是唯一的现实,他小说中的人物热爱澳大利亚的土地,然而,他们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一种被放逐的感觉,小说家在刻画这些人物的时候自觉地脱出身来反观自己的一切荒诞举止和言行,在他看来,一切所谓的现实其实都是虚构。

乔莉是上述七位小说家中唯一的女性,她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发表短篇小说。80 年代初,她开始出版长篇小说,是 80 年代澳大利亚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乔莉塑造的人物大多是失去家园的人,他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时面对人生的选择,他

们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在家园与流亡之间、在疼痛和荒诞之间、在平庸与荒诞不经之间、在真实与谎言之间、在前景与背景之间往返。乔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斯科比的谜》中的斯科比先生是一个八十五岁的退休音乐教师,小说一开始,他住进了一家老人院。斯科比先生一直问自己——什么是人生中唯一确定的东西?——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死亡,这样的答案令他感到沉重,斯科比常常沉湎于过去,因为他看不见未来,他的家人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快乐,但老人院里的种种邪恶势力同样让他如陷囹圄。

80 年代的澳大利亚“新小说”比较一致的特点是:崇尚智力游戏,嬉戏荒诞,充满意外、悖论、矛盾和不安定,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百物诸事不过是表面现象,在它的背后是荒诞不经的现实,小说所呈现的一切不过是覆盖在真实之上的幻影。从创作方法来看,澳大利亚的“新小说”令人想起欧美的后现代小说,不过,澳大利亚的“新小说”不同于法国的“新小说”,因为法国“新小说”给人以枯燥的感觉,而澳大利亚“新小说”在故事性上明显富有色彩,人物也相对鲜明,从这个意义上看,澳大利亚的“新小说”更像当代南美小说,虽然澳大利亚“新小说”家或许并没有通过翻译第一时间了解到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但是,当这些拉美作家的作品最终被译成英文并传入澳大利亚之后,它们实实在在地让澳大利亚的“新小说”家们吃了一惊。(Daniel: 21—22)

三

杰尔德(Ken Gelder)和索尔斯曼(Paul Salzman)认为,上世纪 90 年代的澳大利亚小说继续呈现一种多元格局,其中出现了

一种“后现代文学小说”(postmodern literary fiction),代表作家包括莫内恩、杰克(Antoni Jach)和J. M. 库切(J. M. Coetzee)。(Gelder & Salzman: 101—10)平心而论,若以“后现代”而论,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坚持后现代小说实验方面最执着、成就也最大的作家不是莫内恩,也不是杰克,而是凯里、库切和卡斯特罗(Brian Castro)。1990年以后,凯里先后出版小说《税务检查官》(*The Tax Inspector*, 1991)、《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 1994)、《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 1997)、《“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2000)、《我的虚构人生》(*My Life as a Fake*, 2003)、《窃:爱情故事》(*Theft: A Love Story*, 2006)、《他的非法自我》(*His Illegal Self*, 2008)、《帕洛特与奥利维亚在美国》(*Parrot and Olivier in America*, 2010)和《眼泪的化学》(*The Chemistry of Tears*, 2012),在这些作品中,凯里基本保持了他在70年代就已形成的创作形态,并将一种后现代焦虑情绪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地方的以及他本人的身份相结合,写出了一批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优秀作品。凯里的小说细节丰富、叙述方法多变、故事性强,他将在“新小说”时代获得的丰富的写作技巧非常好地反复运用于澳大利亚历史和传说之上,小说《杰克·迈格斯》采用一种反写经典的叙事模式,将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刻画成反抗殖民帝国并获得救赎的自新之地,小说立足后现代的游戏精神将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历史整体地颠覆过来,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叙述效果。《“凯利帮”真史》和《我的虚构人生》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以一种近乎神奇的方法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内德·凯利(Ned Kelly)和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文学骗局中的

虚构人物重新生动地演绎了一遍。凯里的这些作品证明了后现代小说的实验性加上澳大利亚的题材完全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当代作家,同时他的成功也证明纯粹的文学小说并没有因为曲高和寡而失去读者。(Gelder & Salzman: 105)

卡斯特罗195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具有中、英、葡三种血缘,1982年凭借处女作《候鸟》(*Birds of Passage*)荣获澳大利亚沃格尔创作奖(Vogel Prize)。90年代先后出版《珀姆罗伊》(*Pomeroy*, 1990)、《双狼》(*Double-Wolf*, 1991)、《中国之后》(*After China*, 1992)、《飘移》(*Drift*, 1994)、《舞者》(*Stepper*, 1997)、《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 2003)、《园书》(*The Garden Book*, 2005)和《浴间赋格曲》(*The Bath Fugues*, 2009)等八个长篇。卡斯特的语言浓密,形式凝重,叙事过程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他的小说大量融合真实与虚构,所以在多部小说中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设计叙事,例如,《飘移》讲述了英国著名实验主义小说家B. S. 约翰逊的生平和自杀故事,《双狼》讲述了弗洛伊德的所谓“狼孩”的故事,小说叙述了弗洛伊德的“狼人”(Wolf Man)——一个名叫潘克杰夫(Sergei Pankejeff)的俄罗斯贵族——的故事。《上海舞》以自传的形式,从一个华裔澳大利亚移民的视角记录了传主一家上世纪30到60年代在上海、香港和澳门的生活经历,小说融汇了叙述者的个人回忆、轶事、照片和家族秘密,通过融合真实与虚构构建一个家族历史和移民故事。《园书》讲述了一个乡村教师的女儿跟激情但略嫌粗暴的达蒙(Darcy Damon)的婚姻以及她与一个名叫甄琳(Jasper Zenlin)的美国航空设计师的恋情故事,小说的诸多细节直接借用了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但真人真事在这里被赋予了虚构的意义,故事情节通过

一种后现代的羊皮纸效果层层叠叠地呈现出来。

库切曾是南非著名小说家,2002 年移民澳大利亚,后入澳大利亚国籍,2003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初到澳大利亚的库切并没有引起澳大利亚批评界的注意,但他很快出版了他抵澳后的首部小说《伊丽莎白·考斯特罗》(*Elizabeth Costello*)。此后他又相继出版了小说《慢人》(*Slow Man*, 2005)以及《凶年日记》(*Diary of a Bad Year*, 2007)。《伊丽莎白·考斯特罗》一问世便令澳大利亚文学和批评界大为震惊。小说开宗明义地指出,标题中的女性是一个澳大利亚女作家,曾旅居英法等国,多次前往非洲,不过,关注她作品的批评家主要集中在美国,她倡导民族主义,主张澳大利亚作家为澳大利亚读者写作。小说记叙了她应邀到世界各地作报告的种种情形,小说的主体部分由考斯特罗的系列演讲构成,这些演讲讨论了小说家如何能深入地进入动物和杀人犯的内心世界去体会他们的内心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不少演讲实是库切自己近年来在各个地方发表的文章和演讲,通过这样的处理,作者与小说人物被强行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作家在创作中如何跳出自我去深刻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内心世界,成了读者无法解决的难题。考斯特罗在库切出版的下一部小说《慢人》中再次出现,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雷门(Paul Rayment)是个法国移民,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一条腿后,他请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女性移民前来照顾,并在此过程中对后者产生了感情;但就在此时,小说家考斯特罗出现在雷门面前,并对他说:你是我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于是读者发现,考斯特罗作为一个小说家游走在现实和自己虚构的世界之间,与

此同时,作为小说家的库切再一次与考斯特罗合二为一。小说将后现代小说中的一个实验手法巧妙地用于对当代澳大利亚多元社会现实的观察之中,为表现当代澳大利亚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路径。(Gelder & Salzman:133—35)

四

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在 70 年代“新写作”中开始,经过 80 年代的“新小说”和 90 年代的“后现代文学小说”,历经 30 多年的演绎和发展,在澳大利亚文坛上形成了不小的影响。至上世纪末,澳大利亚文坛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就此而言,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不可谓成绩不大。但是,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较之英美后现代小说至少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在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始终没有明确地确立一个以“后现代”命名的创作群体和流派,虽然人们有时把 70 年代的“新写作”和 80 年代的“新小说”统称为澳大利亚“新小说”,并通过与法国“新小说”的联系,把它笼统地视为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但是,澳大利亚的文学史家至今仍然拒绝用“后现代小说”来指称上世纪 70 年代启动的澳大利亚实验主义创作潮流,曾经参与其中的小说家也大多回避这样的命名。作为一种小说创作取向,虽然澳大利亚的后现代小说曾经零星地吸引过作家,但是坚持用后现代的手法从事小说创作四十年不变的作家凤毛麟角,到本世纪初,曾经的“新写作”小说家中只有凯里还硕果仅存。

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在于,不论是早期的“新写作”,还是“新小说”,还是“后现代文学小说”,其基调较之欧美后现代小说都更严肃。杰尔德和索尔斯曼认为,要理解 90 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

后现代小说,应该首先区分两种后现代,一种是以贝克特(Samuel Beckett)为代表的悲观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后现代小说完全不相信叙事的有效性,另一种后现代小说追求一种崇高的目标,它一边对叙述高度自觉,一边高度肯定叙事的重要性,在这种态度下写成的小说往往少了一种游戏,多了一份严肃的“后现代崇高”(postmodern sublime)。总体而言,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选择了后者,它是欧美后现代文学移植到澳大利亚并在澳大利亚本土化之后形成的特殊产物。(Gelder & Salzman:130)

最后,澳大利亚的后现代小说至上世纪 90 年代迅速走向衰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右翼保守势力对澳大利亚政治的控制日益加强,文学艺术因此失去了往日的单纯,变成了政治斗争的角力场。在短短数年之中,围绕德米登科(Helen Demidenko)的小说《签署文件的手》(*The Hand That Signed the Paper*)和加纳(Helen Garner)的非虚构文集《第一石》(*The First Stone*)产生的争议不断,文学创作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更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澳大利亚不同文化势力之间斗争的战场。(Gelder & Salzman:214)在激烈的“文化战争”(王丽萍等:345—57)中,后现代小说被当成了一种“后现代”文化流行病和一场亟需扑灭的国家灾难,在这种氛围之下,90 年代以后的澳大利亚社会对后现代小说的态度悄然发生了改变。

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的成长和发展轨迹或许与澳大利亚社会对待外来思潮的一贯态度有关。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麦考利(James McAuley)和斯图尔特(Douglas Stewart)针对现代主义诗歌刊物《愤怒的企鹅》(*Angry Penguins*)主编哈里斯(Max Harris)一手导演了著名的“厄恩·马利大

骗局”(Ern Malley Hoax),直接导致了现代主义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长时间停滞。不过,现代主义最终还是浩浩荡荡地来了,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40 年代以后的澳大利亚文学在怀特等人的努力之下最终接受了现代派的写作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90 年代的澳大利亚一片抵制后现代的批评声浪中,澳大利亚的“文化斗士们”反复将怀特视为现代澳大利亚文学的核心经典,在反后现代的评论家看来,历史上的现代主义在世界各国曾经承担过革新文学创作方法的使命,因此在当代的澳大利亚文坛,现代主义尚有其独特的作用。今天的澳大利亚需要现代主义,不仅为了抗击现实主义,更为了抗击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宏大叙事对社会和世界的改造作用,所以,澳大利亚需要现代主义特有的价值取向,并用它去抗拒虚无的后现代主义。(Gelder & Salzman:99)

上世纪 40 年代,现代主义被澳大利亚视为一种来自欧洲的、有可能破坏民主平等的有机社会的颓废思潮,一种来自美国的、有可能腐蚀澳大利亚年轻而健康的心灵的商业化思想,所以被严格予以抵制,(Carter:78)但现代主义最终还是在澳大利亚确立起来,这说明澳大利亚在接受外来现代主义思潮的问题上取得了迟到的进步。的确,“迟到”和“滞后”同样是理解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正如上世纪前半叶的澳大利亚批评家用现实主义标准坚决抵制现代主义一样,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批评家用现代主义作标准坚决地抵制后现代主义。根据这样的规律,我们不妨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澳大利亚作家和批评家或许也会更多地接受后现代主义,但是,澳大利亚在接受外来思潮的过程中常常会“滞后”一些,这一点应与澳大利亚这个后殖民国家

的地理、历史以及国家自我身份的定位密切相关,值得我们持续地关注。□

参考文献:

1. Brown, Ruth. "Cyberspace and Oz Lit; Mark Davis, McKenzie Wark and the Re-Alignment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Issue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Ed. David Callahan. London: Frank Cass, 2002.
2. Carter, David. "Critics, Writers, Intellectuals: 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Its Criticism." *Modern Australian Criticism and Theory*. Eds. David Carter and Wang Guangli. Qingdao: China Ocean UP, 2010.
3. Daniel, Helen. *Liars: Australian New Novelists*. Ringwood, Vic.: Penguin, 1998.
4. Gelder, Ken, and Paul Salzman. *After the Celebration: Australian Fiction 1989-2007*. Melbourne: Melbourne UP, 2009.
5. Goldsworthy, Kerry. "Short Fic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Ed. Laurie Hergenhan. Ringwood, Vic.: Penguin, 1988.
6. Hauge, Hans. "Post-Modernism and the Australian Literary Heritage." *Overland* 96 (1984): 50-51.
7. Kiernan, Brian, ed. *The Most Beautiful Lie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by five major contemporary fiction writers, Bail, Carey, Lure, Moorhouse and Wilding*.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77.
8. Lever, Susan. "Fiction: Innovation and Ideology." *The Oxford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Eds. Bruce Bennett and Jennifer Strauss. Melbourne: OUP, 1998.
9. Munro, Craig. *The First UQP Story Book*. St. Lucia, Queensland: QUP, 1981.
10. Torre, Stephen. "The Short Story since 195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Ed. Peter Pierce. Melbourne: Cambridge UP, 2009.
11. Turner, Graeme. "Film, Television and Literature: Competing for the Nation." *The Oxford Liter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Eds. Bruce Bennett and Jennifer Strauss. Melbourne: OUP, 1998.
12. Wilding, Michael. *The Tabloid Story Pocket Book*. Sydney: Wild and Woolley, 1978.
13.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4. 黄源深:《澳大利亚的现代主义为何姗姗来迟?》,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
15. 王丽萍等:《“理论”消退与文化战争》,载王守仁等编《华东外语教学论坛》(第三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FOREIGN LITERATURE

BI-MONTHLY, NO. 1, 2014

Editor: HU Wenzhong

Associate Editors: JIANG Hong, MA Hailiang

Selected Abstracts

LU Quanzhi **The Strategies of Speech Presentation in Jean Giono's *The Man Who Planted Trees*** 3

The Man Who Planted Trees, published by the French writer Jean Giono in 1954, has since been enjoying lasting popularity among readers and is now generally regarded as an excellent piece. It tells the story of a widower who plants trees on the desolate highlands near the Alps and finally succeeds in transforming the barren region into an earthly paradise. Taking its narrative features and speech present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essay endeavors to disclose how the author has achieved such a huge success by first-person homodiegetic narration, while praising the old man's selfless action and noble mind by rendering his voice seemingly invisible through adept manipulation of speech presentation.

XU Qinghong **"Writing as Re-Visi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in Adrienne Rich's Feminist Poetry** 14

By presenting "writing as re-vision", Rich integrates her political idea with her aesthetic quest, and practices it in her feminist poetry. The argument is specifically elaborated in two aspects: first, by analyzing Rich's use of female persona's confessional nar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ich reconstructs women's individual, so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Second, it probes Rich's consciousness of language, discussing how she proposes the use of "common language" to deconstruct the power structure of patriarchal language. The paper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 that Rich successfully enodifies her political commitment upon her poetic aesthetics, and with "writing as re-vision", constructs the poetics of women. This finding may facilitate the domestic scholarship on Adrienne Rich which has just been initiated.

ZHANG Yan **Reflection on the Turning to the Form Study in British Romantic Poetry — Taking "Tintern Abbey" as an Example** 27

Since the 1970s, the criticism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has explored a series of new critical approaches in the aspect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tudy, and the new-historical study, the cultural study, the ecological study etc..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aesthetics and the study of the form inherited from the New Criticism have been ignored more or less. However, there appears the tendency of turning back to the study of the form from the mid-1990s, which is shown in the reading of Wordsworth's "Tintern Abbey" particularly. The fact that the literary criticism turns its attention to literary form proves the necessity of calling back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in literary study, yet this turning back to the form study will never go beyond the post-modern way of thinking. The aesthetic and form study will surely become one literary critical approach with multi-theoretical views close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poetic criticism.

WANG Labao **Postmodern Fiction in Australia: A Brief Outline** 36

Postmodern fiction in Australia emerged as early as in the 1970s under the name of New Writing and it became the New Novel in the 1980s and "postmodern literary fiction" in the 1990s. Within some three decades, it formed a tradition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1) Australian postmodern fiction has seldom been called by that name; 2) Australian postmodern fiction was as much interested in the sublime as it was in the playful; 3) Australian postmodern fiction shrank in the 1990s as a result of the conservative backlash against postmodernism. The fall of postmodern fiction in Australia resembled that of modernism

in early 20th century and its rejection at the hand of right-wingers is another example of Australia's post-colonial belatedness in accepting anything radically new from abroad.

SHANG Jingjian Is It of Literature, History or Myth? — On the Origin of Don Juan 45

As a classical literary image, Don Jua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ur greatest character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other three being Don Quixote, Hamlet and Faust. A lot of artistic works on various themes have been created around this image. The image of Don Juan gets reborn frequently in different periods, revealing its distinctive feature of openness. While in contrast, the origin of Don Juan remains uncertain.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statements upon his identity. First, Don Juan was a fictional figure created by Tirso or other writers. Second, Don Juan is a real historical figure transformed in folk tales. Thirdly, Don Juan, like myth, is the incarnation of the carnival of humanity as well as the trespass of heterodoxy.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prominence of his image and the obscurity of his origin enhances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interpretation, which promotes Don Juan's endurance in world literature.

LI Wanwen The black humor on *L'Ecume des jours* 53

The French surre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given a great influence on westerners' spiritual aspect and life style. The surrealist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denial of real society and they attempt to find a new approach to change it. Black humor is an artistic method with which surrealists apply to change life and the world. Black humor is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novel *Foam of Times* and also the hope which the author can see in face of the hopeless reality of society.

SUN Xiaomeng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Bureau in British Northern Niger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and Power 61

The Literature Bureau was conceived of as a transitional agency which would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of a viable literary system to the colon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It was intended to be flexible, responsive and creative, sometimes paradoxical.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Bureau in British Northern Nigeria involve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Bureau, Gaskiya Corporation and Northern Region Literature Agency.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style which includes Istanci, Imamanci and Gaskiyanci composed the colonial discourse and reflected the developing path of Literature Bureau and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order in Northern Nigeri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 power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hegemony in the colon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Literature Bureau and vernacular language style.

YAO Feng Achebe and the Linguistic Dispute in African Literature 69

Whether to write in native African languages or in alien European ones has long been an issue of unyielding dispute among the writers and critics of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summarize and compare the opposing views, respectively of Chinua Achebe and of Ngugi and Wali, in terms of the noumenon of African literature, its target read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ve African languag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eleuzian view on literary language on the part of Achebe is an attempt to deconstruct such dualism as embodied by Ngugi's and Wali's essentialist beliefs in literary language. As a sort of minor language, the European languages adopted in African literature is no "minor appendage" to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but rather a potentially deterritorializing force to them.

ZHOU Xiaoli Calvino'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 His Early and Later Periodization 81

Calvino's early works we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Italian social reality, but his later works changed to focus on exploring the forms of fiction. This change was crucial for Calvino's career, for it turned him into a classical Postmodern writer from a writer of little fame in Italy. The main reason to which this change could be attributed was his early political experiences, where he gradually understood